

●黄懿陆 著

中国先越文化研究

——从壮族鸡卦看《易经》起源



姜双方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先越文化研究：从壮族鸡卦看《易经》起源/黄懿陆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

ISBN 7 - 222 - 04905 - 3

I. 中... II. 黄... III. ①周易—研究②壮族—占卜—研究—中国 IV. ① B221. 5 ② B99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195 号

责任编辑：张 波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刘伟能

书 名	中国先越文化研究 ——从壮族鸡卦看《易经》起源
作 者	黄懿陆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6. 625
字 数	460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排 版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7 - 222 - 04905 - 3
定 价	39. 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黄懿陆 男，百越民族后裔。1978年进入大学就读中文系时就喜欢业余研究历史和民族学。1982年2月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后，先后任文山州委办公室秘书、科长，文山州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山梅》、《含笑花》主编和省政协研究室处长等职。在繁杂的工作中一直坚持业余研究工作，现为云南政协报社总编辑，仍然保持着业余研究史学的苦行僧习惯。出版过《壮族文化论》、《滇国研究》、《滇史散论》、《滇国史》、《山海经考古》等学术著作。

前 言

古人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今人说《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人说《易经》是世界唯一既有文字又有卦象的天书……

在中国皇家《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编辑系列中，《易经》居于首位，当今中国，有关《易经》研究的机构数不胜数；就世界范围而言，有学者把《易经》与《圣经》、《吠陀经》并列为三大文化宝典，研究《易经》的学术团体遍布世界各国，国际易学研究会开了一轮又一轮……

那么，《易经》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呢？占卜家说它是占筮书，气象学家说它是天文气象书，农业家说它是农事书，历史学家说它是历史哲学书，而文学思想家说它是一部文字优美、结构严谨的人文书……众说纷纭，就如瞎子摸象，各言其是。但更多学者认为，《易经》是我国远古先民的一种科学，一种符号逻辑，代表了数理的，宇宙生命、个人生命的作用，是叙述人类太阳系统的宇宙中，日、月运行的一个大法则。《易经》居于《诗》、《书》、《礼》、《乐》、《春秋》等群经之首，对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以及天文、历史、数学、医学、气功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享有极高地位。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易经》文字艰深，过于精练，故芸芸众生中，《易经》义理学者并不太多，依卦看象的却不少。所以，易学在平民百姓中占有极其广大的市场。

研究《易经》，特别是通过研究《易经》的起源来探讨中国上古历史，自古以来，本书是第一部。其研究方法是通过壮族鸡卦与易卦的比较，寻找彼此之间有机统一的规律性，从中探索中国上古历史的源头和发展历程，与《易经》的起源密切相关。



《易经》起源是易学研究的一部分。在易学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其成果已是车载船运，令人惊叹！但它的起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发出了辉煌灿烂的光芒，得到了无数人的赞叹，受到了天下人的景仰，但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成功，看到了他的潇洒，看到了他的登峰造极，却不知他的出处，不知他的身世来历，更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

所以，有学者认为，《易经》是“一部流传六七千年的书，要追溯它出于何年何月，作者何人，恐怕不是一件寻常之事。但对于像《易经》这种震撼世界的宝典，人们去追溯它，考证它，以便找出更能破译宝箱的理论依据，情之所钟，自然无可非议。于是千百年来，无数学者穷经皓首，花毕生的精力去论证、考究它。但如果仅是为了论证谁是《易经》的作者，追踪其具体成书年月，却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说这样的话，恐怕欠妥。一棵大树，不能因其枝繁叶茂而忘其根；一条江河，不能因其浩浩荡荡而忘其源；一个人，不能因其成功耀世而忘父母；一个民族，不能因其辉煌比翼而数典忘祖；一部《易经》，不能洋洋大观数千年而无其本……寻找《易经》的原始作者，不要因为困难重重，无从着手，就认为此事没有意义而放弃学术追求。况且，《易经》原作者完全可以找到，关键是怎样来理解《易经》，从什么角度去探讨《易经》的起源问题、寻找《易经》的作者。

数千年来的学术界，一直把《易经》当成中原文化的宝典，当成中华文化的源头，故从没有人把《易经》与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联系起来。所以，没有人知道，可能也没有想过，更不会去思考，特别是没有去研究和探讨，就不会知道易卦与先越之民鸡卦的关系，是同源共体、一母同胞的血缘关系。

笔者研究《易经》，探讨《易经》的起源，寻找《易经》的作者，证明壮族鸡卦与易卦彼此之间的同源关系，主要依靠以下依据：

一是史料记载。汉朝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孝武帝本纪》中说：“是时既天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漫怠，故

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汉武帝帝能把越人鸡卜引进宫廷，说明属于越人专利的鸡卜巫术相当成熟，预测的成功率相当高，影响相当大。此后，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人邝露所著《赤雅》等文献中，亦不乏越人及其后裔壮族有关鸡卜的记载。当今壮族村寨，鸡卜的巫者随处可见，只要稍微留心，壮巫世家流传的鸡卜手抄本还相当多。笔者手中，就有五六本可读。每一手抄本，记满了若干不同卦象的鸡卦，多者四五百卦，少者百余卦……认真细读之后，总感到与《易经》有不少相同之处：首先是都有卦象和爻数，只是壮族鸡卜卦的爻数可数，最多的有十五六爻，但《易经》不管怎么数，只有六爻；其次是都有阴阳爻；其三是每一卦都有卦名；其四是都是对称卦；其五是《易经》八卦的卦名是汉字但不是汉字意思，壮族鸡卜卦的卦名也是汉字而非汉意。对于《易经》八卦的卦名，笔者认为说是汉字而不是汉字意思，这是有充分依据的。譬如：乾为什么代表天？坤为什么代表地？兑为什么代表泽？坎为什么代表水？巽为什么代表风？艮为什么代表山？震为什么代表雷？离为什么代表火？倘若乾、兑、离、震、巽、艮、坎、坤都是汉字且为汉意的话，就都不需要代表了，只要写上天、泽、火、雷、风、山、水、地就得了，何必还要写上这许多绕圈子、需解释的代表字。而且，中国上古时代是没有汉族的，《易经》的产生是在没有汉族、没有文字，而只有语言、传说和神话的远古时代，我们为什么只从汉族的角度去理解《易经》呢？也许，有人要说《易经》是完全的中原文化，是彻底的中华宝典，当然要从汉族的角度去理解了。可是，《易经》八卦据说是伏羲所画，伏羲画八卦传说是六七千年前的事，你能确认《易经》八卦一定形成于中原吗？还有，远古时期的中原到底是怎样的呢？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遗传学博士李辉从人类学的角度于2005年初在《北大中文论坛》发表言论说：“古人类学资料已经证明，在现今中国和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蒙

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各族、南岛语系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ngoloid—Australoid hybrid forms）的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①《易经》八卦卦名是汉语记音的先越民族语言，先越语言属于原始汉藏语系的侗台语支，中原远古部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很可能就是属于“侗台语支”的先越语言。至今，学术界不明白《易经》八卦卦名的本义，但笔者用先越民族后裔之一壮族语言去解读八卦卦名，很快就把《易经》八卦卦名本义的谜底解开了。这就说明，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先越语言在东南沿海和中原一带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认为，先越民族后裔之一壮族的语言可解《易》之八卦卦名的本义。为此，《广西政协报》副总编辑胡正民与记者邓进利专门对笔者进行采访，写了题为《用壮语破解〈易经〉八卦的历史谜团》的长篇报道，刊发于今年1月21日的《社会特刊》，向社会各界介绍笔者的研究成果。

二是考古文物。据20世纪末易学研究的科研成果，汉朝之前，早期《易经》见诸文物的只有数字卦，而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卦象。譬如“乾”卦，乃是用三个“五”，抑或用三个“一”、三个“七”类似的奇数来代替。这就是说，奇数表示阳，偶数表示阴，所谓易学又名“九”“六”之学，讲的就是天和地、阳和阴、男和女，以及奇数和偶数……因而，《系辞上传》以数字代表天地，归纳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所谓“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就是把天数的一、三、五、七、九进行奇数相加，得数二十有五；地数

① 转引自苏三：《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第13～14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

二、四、六、八、十进行偶数相加，得数三十；然后再把二者相加之后得出来的。故《易经》产生之日起，就与数字密不可分。出土于大汶口文化遗址墓地 M26，所谓象牙刻划的“太阳循环图”共有 55 道刻痕。这些刻痕在当时代表什么？有学者根据刻痕的排列提出是阴阳爻，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易经》中阴阳爻产生的时间是很晚的，而据出土文物，《易经》是以数字来表示的（直到汉代，《易经》的卦爻还是以数字来表示）。故 6000 年前的大汶口时代，象牙上的刻纹只能是古代数字的遗留。亦即一道刻痕是一个算筹，代表一个数字，55 道刻痕就是 55 个算筹，代表的就是天地之数。在河南、陕西等省，出土不少战国时期的算筹，就是一根根骨头制成的，当今农村大人教小孩计数所用的火柴条子，与古代算筹在使用方法和达到目的方面，可谓是一脉相承，历久不衰。以出土的骨制算筹为例，可证大汶口的象牙刻纹是远古时期算筹的萌芽。可以说，没有数字，就没有《易经》。那么，《易经》的数字从何而来？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来自于先越之民的鸡卜卦象。笔者的这个观点，有可靠的出土文物来做支撑。最早的文物来自于河姆渡文化时期，是为八卦的定型期。这一时期距今 7000~6600 年，约在 6000 年前左右，正是所谓伏羲画八卦传说产生的时期。据出土文物的图案分析，八卦此时已经出现，而且卦象表明，《易经》八卦毫无疑义源于鸡卜卦。从《易经》八卦在 6000 年前左右定型开始，《易经》八卦传承的历史约有 4000 年左右，直到商朝中晚期才自然重卦为六十四卦。笔者的这个判断，来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龟甲易卦材料，上面刻有鸡卜卦象“𪚩”和“九”、“六”并列。所谓鸡卦，主要由卦名、鸡股骨、竹挺组合的卦爻和筮辞构成。龟甲上的鸡卦，其卦名为“九”、“六”；两组鸡卦符号上的直线即鸡股骨，三条横线为插在鸡骨上组成卦爻的竹挺。其中一条直线和三条爻线与奇数“九”结合，直线随卦名是奇数亦代表数一（或三、五、七、九），而横线也代表奇数，为数三（或一、五、七、九），把它们“连山”（这是汉语记录的先越读音，“连山”是壮语“跟三”的意思），即卦名数、鸡骨数和爻数相跟，得数“九（卦名）”、“一（鸡骨数）”、

“三（爻数）”，这个“九、一、三”之数，都是奇数，亦即天数，就是易中“乾”卦之数；而另一条直线和三条爻线与偶数“六”结合，其卦名“六”为偶数，跟随卦名“六”的直线是一个数，也要随卦名变而为偶，实际数为一，但要看成偶数二（或四、六、八、十），而横线也要随卦名变为偶数，实际数为三，但要看成偶数六（或二、四、八、十），把它们“连山”，就是把卦名数、鸡骨数和爻数实行三数相跟，得数“六（卦名）”、“二（鸡骨数）”、“六（爻数）”，这个“连山（跟三）”出来的数是“六、二、六”，它们就是《易》中“坤”卦之数。

考古学上的研究证明，安阳出土的殷商晚期龟甲上的鸡卦符号与其平行的“九”、“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卦体，笔者对它的成功解读提出了两个不能不引起学界深思的问题：首先是《易经》的数字卦毫无疑问来自鸡卦，如此，“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一类的古说就值得考虑。揲的意思是数，文献上都说数来自蓍草，但文献出现的时间很晚，在文字成熟的殷商时期，当时的文献记录就是甲骨文，通览所有出土的甲骨文，寻找不到《易》的只言片语，看到的只是《易》之数字卦，这就说明：殷商之前的易，是以数字的面目出现的。而数字从何而来，出土文物提示来自鸡卦。既然易之筮数的源头是鸡卦，而鸡卦本身由卦名、鸡股骨、竹挺与筮辞四部分组成，汉文古籍中易筮乃古用筮草的说法就是不对的。既然易为筮的一种，筮是计数，或叫算术。古算字写为“算”或“祿”，则“算”、“算”和“筮”都与使用竹筹有关，而鸡卦用“竹挺”，与早期计算工具用竹吻合。再者，古“祿”字是与祈神有关的两个“示”字，上面提到的殷商龟甲上的两个鸡卦符号，就是一对相辅相成且吻合对称的祈天求得神示的筮器符号。以此为据，易数源于鸡卦是没有问题的。其次，东汉郑玄对《连山》的解释“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也”是不对的。一般地说，《连山》是夏代之易，时间距郑玄有近二千年，郑玄没有见过甲骨文，可见其说无据。根据笔者对龟甲上刻写的鸡卦符号的解读，可证“连山”是先越语言“跟三”的意思。由此推及商朝的《归藏》易名，也不是汉人解释

“把天下财富归藏于地”的意思，而用先越后裔壮族语言来解释是“三的重叠”的意思。“三的重叠”，是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的必然规律，揭示这个规律内涵的出土文物就是殷商时期龟甲上的易卦材料，反映了“归藏”就是“三的重叠”的历史事实。其两个“三的重叠”符号与“连山”的鸡卦符号出现在同一片龟甲上，说明“连山”和“归藏”的内涵符合壮语的意思。由此看来，汉人对古易卦名卦象来源的误解，不仅仅局限于此，包括上述提到对《易》之八卦卦名本义的认识和解读，自汉代以来都是一种不明真相的解读方法。

过去，由于没有开展对壮族鸡卜卦的研究，学术界对壮族鸡卦了解不够，故中国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只知道安阳出土龟甲上的符号与《易经》重卦有关，但尚不清楚是什么符号。而笔者一看就明白这是鸡卦符号，对这个鸡卦符号进行演示之后，其数与龟甲上的五组易卦数字吻合。而且，龟甲上还有夏之《连山》易、商之《归藏》易的符号说明，证明了夏朝和商朝使用的《易经》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夏朝一直使用的是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定型了的八卦，八卦亦即《连山》易。众多学者对《山海经》中迷惑不解而又无处不在的“使四鸟”，指的就是“四鸟”所生出的八卦亦即夏朝无处不在使用的《连山》易。到了商朝中晚期，八卦《连山》易才向六十四卦进行自然重卦，是为《归藏》易。《易经》自产生之日起，根本不存在错卦、变卦和互卦的问题，而是自自然地重卦。

三是民俗资料。《史记》提到的“越人鸡卜”，一直在越人后裔之一的壮族巫职人员当中传承。当今壮族主要聚居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泛流传着许多鸡卜卦的手抄本。里面记着不少鸡卜卦象，都是《易》之单体卦，亦即八卦。所谓八卦，就是《易》未重卦前的八个单体卦。对于鸡卜卦而言，尽管严格地按照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龟甲上鸡卜卦符号的提示，进行类似夏朝《连山》易有规律性的演绎，但所有鸡卜卦都是只有八个单体卦。对此，笔者总结出了壮族鸡卜卦与《易》卦存在的互为一体的十大

关系和五条原则，并且在今年春节期间总共花了三天时间演绎了 3000 多卦鸡卦，翻来覆去，凡是单体卦，3000 多卦中只存在《易》之八卦，其余的都相重于八卦之中。然后把 3000 多卦自然重卦为 1500 多卦，重卦下来只有《易》之六十四卦不重复，其他多余的卦都是重复于六十四卦当中。由此可证，《易》卦源自鸡卜卦，这不仅仅是以卦象筮数的来源问题；而且，《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名完全与鸡卜卦的卦名吻合。所不同的是，《易经》卦名来自鸡卜卦名含义的提炼、总结和吸收，把壮族鸡卦名的两句话，综合其意，浓缩成一个或两个字。譬如位于《易经》第 21 卦的“噬嗑”卦，其意是有吃有吐，而在壮族鸡卜卦中，单体下卦为“吃”的意思，单体上卦为“吐”的意思，进行自然重卦后，得《易经》“噬嗑”卦象，其卦象和卦名含义一致。又如位于《易经》第 8 卦的“比”卦，在壮族鸡卜卦的两个单体卦中，看是下卦还是上卦哪一卦吉，两卦之间分别是按数之大小比出来的，将它们进行自然重卦之后，就是《易》之“比”卦的卦象。再如位于《易经》第 41 卦的“损”卦，壮族的两个鸡卦的单体卦都带有多嘴的意思。多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会讲人闲话，会议论东家长、李家短；这样就会得罪人，带来的是损人的后果。将这两个单体卦进行自然重卦后，卦象正是《易》之“损”卦。还有位于《易经》第 14 卦的“大有”卦，在壮族鸡卦中的下卦是说，不要看我的卦爻少；上卦则说，我的卦爻很多，份量很重，可以用秤称一千次。这上下两卦进行自然重卦，就是《易》之“大有”卦的卦象，其间的意思不是一样的吗？再看位于《易》之第 15 卦的“谦”卦，壮族鸡卦的上下两个单体卦的意思是说，不管你的眼睛好坏，我都要等着，与你同行，显得谦虚谨慎，这两个单体卦进行自然重卦后，是为《易》之“谦”卦的卦象，彼此之间的意思是一致的。如果说这是巧合，那《易》之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象，分别与鸡卦对应相比，卦卦如此，彼此之间若不是同源共体的关系，怎么可能吻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呢！

四是远古文字符号的研究。目前，在壮族骨刻历算器上既刻有可以转换为《易经》数字的鸡卦符号，同时刻有远古时期的文字符

号。其中，鸡卦符号有 30 个，远古时期的文字符号有 21 个。这 21 个文字符号，笔者之所以冠以“远古”之名，是因为它们和我国迄今为止出土新石器时期文物中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期的文字，当代学者是因为文物的出土且经过研究之后才得以发现和确认的，倘若没有出土文物，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远古还有这些文字符号的。如此，壮族代代相传的鸡卦骨刻历算器当中保留有远古时期的文字符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而且，经过比较研究，留在壮族鸡卦骨历上的远古文字符号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均可一一找到对应的文字材料。有关学者认为：“蚌埠双墩遗址位于江淮流域，在这里出土一批数量如此可观、时代相当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西安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发现再一次表明，至少在距今六七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的先民具有一定水平大的用符号记事或表现某些概念的能力。”^①而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文物中的文字符号有 26 种与壮族保留的文字符号类同，几乎占了该遗址出土文字符号的一半。它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壮族远古文字符号的根，基本上可以肯定在河姆渡时期。而且，壮族远古文字符号是留在骨历上的，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鸡卦符号，而鸡卦符号则《易经》之源，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四象骨刻历算器”，就是“四象生八卦”的形象印证，从这一点也可证实壮族传承自先民的文字符号，是先越之民表现某些思维和概念的工具，壮族文字符号传承自河姆渡时期的先越之民，其辗转传承的时间，大约有六七千年之久。

壮族直接传承于先越之民的文字符号虽至今已有六七千年，但其形其状有出土文物佐证，可见一直没有变化，其意亦有可能依然不变。留传并使用于先越之民后裔壮族的远古文字符号虽无变化，但并不意味着由先越之民创造的文字符号就没有发展。根据对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遗址中的文字符号的研究，王震中先生在《从符

①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第 67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号到文字》中认为其中有些符号的形状结构，“已颇有甲骨文那样文字的构字风格”^①。而在这些与甲骨文接近和类似的文字符号中，有三种文字符号在壮族从远古先民中传承下来的古文字符号中可以找到其原型。壮族传承自先越之民的语言、鸡卦、文字符号至今仍在使用，其精髓为华夏民族所吸收，其有源可证的事实是：先越民族的语言融会贯通形成汉藏语系；鸡卦因数字变成了以阴阳爻为卦象的通常本《易经》；一部分由先越之民创造的优秀的文字符号发展形成了甲骨文的精华，随后又发展形成汉字，流传使用至今。

五是语言。语言学的资料证明：《易》之八卦卦名是汉字记音的先越语言，而非汉语。同时，我们又知道壮族鸡卦的卦名主要是“忙”、“娄”起头。所以，我们又把壮族鸡卦称为“忙娄卦”。“忙”者，汉语中“你”的意思。在卦中，“忙”卦为地卦，代表个体——你卦，亦即阴魂卦。“娄”者，汉语“咱们”的意思。在卦中，“娄”卦为天卦，代表群体卦，亦即“咱们”卦，也就是阳卦。既然壮族鸡卦以“忙娄”为主，就是壮族鸡卦以阴阳为主，而壮族鸡卦的阴阳以对人的称谓“你”和“咱们”为代表，就是以人群中的个体“你”或群体“咱们”为代表。所以，在流传至今的壮族鸡卦书中，有些书的卦名就是以人的形象为图案来代表卦名的。而要追溯壮族鸡卦以人的形象来代表卦名的历史有多长，我们可以从汉语“咱们”亦即壮语“娄”的出现来探讨和解释这个问题。

在《史记》中，司马迁有记录说“越祠鸡卜”，壮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之一，壮族先祖的鸡卜在汉武帝时期就有名气，而鸡卦名以“忙”、“娄”亦即汉语中的“你”和“咱们”为主，则至少在汉代以前，人称代词之一的“你”和“咱们”就应该在越人鸡卦中大量使用。既然“咱们”一词在鸡卦中大量使用，在壮语当中，意味着使用“咱们”是非常普遍的语言交流现象。如此，这就涉及到语言发生学的问题。语言是什么？语言学家指出：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行为、文化形态、交际工具和符号系统，是社会得以构成、

^①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第6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互动和整合，文化得以创造和持存的最基本的工具，也是基于人性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古代世界，从埃及到波斯，从近东到遥远的北美大陆，语言一直都被视为神灵创世的首要工具。印度的《百道梵书》，甚至于把语言称之为万物乃至诸神的化生与寄形之所。“就已知的初民社会而言，语言又无不以神奇的魔力而居于巫术的核心与禁忌之要目”^①。可见，语言与巫术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壮族鸡卦本身是一种巫术，其中的卦名以汉语中“你”和“咱们”为主，可见，壮族语言人称代词“咱们”的使用从一开始就与鸡卦巫术紧密相连，而最早的鸡卦我们可以找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说明壮族祖先语言“娑（咱们）”与先越鸡卦巫术的结合使用，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汉语中，“咱们”的起源是非常晚的。张清常先生在《汉语“咱们”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汉语人称代词第一身复数有两个。一个是排除式的‘我们’，还有一个是包括式的‘咱们’。‘咱们’不同于‘我们’，‘咱们’包括我方及对方而构成的第一身复数，指（一）你和我，（二）你们和我们，（三）你们和我，（四）你和我们”。接着，张清常继续指出：“‘咱们’不见于古代汉语……”，“‘咱们’出现于宋元。吕叔湘先生 1949 年《说们》《说代词语尾家》两篇论文考证精详，已探观止”。^② 由于汉语“咱们”出现的年代较晚，从其意在壮族鸡卦名中大量使用的情况看，一是说明了作为壮族祖先的先越民族是中国古老民族中使用第一身复数“咱们”的民族之一，二是说明了先越之民使用的鸡卦是中国古老的巫术之一。占卜巫术中的术语“占”、“卜”、“贞”、“卦”都有一个“卜”字，其中的“卦”古读音“圭”，而“卦”读为“圭”音，正是壮语对“鸡”的发音。安阳殷墟出土易卦卜甲上的“𠄎”，在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的《周易溯源》、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中国方术正考》以及《甲骨学一百年》等书中，被当成与易

① 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第 1 页，人民出版社，2005 年。

② 张清常：《张清常文集》，第 73 页，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学研究联系紧密、息息相关的符号，一再被引用，而这个唯一能够解读《易经》来源的关键性符号，就是鸡卦。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与《易经》占卜相关带“卜”的字，常常被刻写为“𠂔”、“𠂔”和“𠂔”，这些“卜”字不管怎么看，都与《易经》的源头“䷖六，䷖九”中的鸡卦符号有关，都是来自先越鸡卜的卦象，是对鸡卦成象后对其竹爻进行减爻的直观反映。如把鸡卦上的三竹爻减去两竹爻，就是“卜”字。形成“卜”字的直线等于“鸡骨”，一点等于插进鸡骨孔窍中的竹挺，也就是形成卦象的爻。

也许，有人要说：是不是壮族鸡卦受了《易经》的影响，或鸡卦是对易卦的借鉴？对此笔者要说：迄今为止，易卦寻找不到自己的源头，最早的出土文物是数字，而卦象的依据也是数字。壮族的鸡卦是以卦象为主，数字是因卦象而得。只有进行“连山”亦即“跟三”，亦即将组成卦象的骨爻之数字相加之和进行“连山”转换后，才能形成《易》之八卦；然后再进行“归藏”，进行“三的重叠”，鸡卦才会自然重卦为《易》之六十四卦。在壮族鸡卦与易卦之间，存在着源与流的必然关系：

首先，根据考古文物证明，《易经》的根只找到商朝中晚期；壮族鸡卦的根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遗址是百越民族之根，壮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之一，这在学术界没有任何疑义。

其次，《易经》传说的伏羲画八卦时期据有关专家研究，时间至少在六七千年前，但寻找不到任何文物支持。壮族鸡卦却可以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找到文物证据，证明八卦出现在先越地区，而先越之民是壮族的祖先。

第三，有关《易经》的解说，对四象是怎么生出八卦来的，至今尚无定论。而研究壮族鸡卦之后，我们可以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找到四象生八卦的出土文物，从而明白《易》之八卦的生成过程。

第四，壮族骨刻历算器上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字符号，这些符号与位于江淮流域的安徽蚌埠吴郢乡双墩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

遗址出土文物上的文字符号有不少相似。这些遗址年代长的距今 8500~7000 年,短的距今 5000~4000 年,都是 20 世纪中晚期才发现挖掘出来,从而使得学者们得以一睹先辈们创造的多姿多彩的文字符号的尊颜。而在壮族骨历上亦有与之相似的符号,这说明壮族先民的祖先——先越民族与之联系密切,甚至可能是这些文字符号的发明、创造者,壮族人民继承了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代代传承到了今天。

《易经》诸谜,惟有壮族鸡卦可以解答。既然壮族鸡卦可解其中之谜,则是易卦源于先越鸡卦的确凿证据。凡此种种,可证先越之民及其后裔之一的壮族鸡卦是源,《易经》是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源异流、一母同胞的关系。

为了便于读者看到壮族鸡卦的原貌,理解壮族鸡卦与《易经》卦名卦象同源共体的血缘关系,本书中分别载有与《易》之六十四卦吻合的鸡卦原始卦象和汉字注音的壮语卦名,并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中的沙、依两个支系的鸡卦名读音为基准,注以国际音标,以保持壮语读音的准确性。

随着对壮族鸡卦研究的深入,笔者深深感到:中国自古以来的天地、阴阳、男女的概念与《易》学同根,龙的文化与凤的文化共生,《易》卦与先越之民发明的鸡卦连体,伏羲画八卦的传说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同源。研究《易》的源头,还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天文学有确证可考的历史文物见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可证中国天文学的历史至少与巴比伦同步,或许比巴比伦还早出数百年甚至更早。所谓世界“星占学的根,无疑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它从所有关于征兆的文献中浮现出来……我们从希腊星占文献中可以发现,希腊人大大发展了星占学。古代星占学的真正中心,无疑是在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从这里,星占学向外发展,最终遍布全世界”的“权威性”学者之说,可以休矣。

早期之《易》,是哲学,是科学,是数学,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

一部《易经》发展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根据对史料、考古文物和民俗材料的综合研究和分析，笔者对流传甚广的先后天太极图（八卦图）的传统排序作了修正，结合自己的认识和八卦本义的内涵，提出了《易》之八卦新概念，作出了全新的八卦图。笔者的结论是：鸡（鸟）卜卦象是《易经》数字卦的源泉，《易经》卦名源于鸡（鸟）卜卦名。鸡（鸟）卜卦亦即《易》之八卦，完整的天地之数与八卦的出土文物见于大汶口文化遗址。伏羲所画八卦源自河姆渡文化时期，传承于良渚文化时期，推广于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建立时期，自然重卦于商朝中晚期，发扬光大于中国的历朝历代……研究中国的远古历史，只要顺着《易经》的阴阳线索追根溯源，中国远古历史的真相就会浮出深潭，去伪存真，大白于天下。

早期的《易》，主要与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社会的改造有关，也与数学有关，与天文学有关，与人类的开天辟地神话亦即文学有关，与稻作文化有关……

笔者通过对《易经》之源的探讨、研究，发现了先夏时期到夏商周三代的远古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发明易学、学习易学、运用易学指导远古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一系列轨迹。笔者的一些提法或有不妥，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黄懿陆写于2006年3月6日深夜